

热历史

古人的包包这么好看



唐代胡人背包俑 西安博物院藏



唐代挎包女俑



敦煌第11窟北壁 西侧壁画晚唐近事女

金陵小袋

电影《抓娃娃》票房一路飙升，片中女主贴在男主耳边念经般的“爱马仕kelly 橙色荔枝纹”迅速成为全剧爆梗，同名话题也冲上了热搜。可谁能想到时尚的尽头是传统，好看又实用的包包，我们祖先早就用上啦。

商周春秋 古早版“国民包”居然还分男女款

《诗经·大雅·公刘》中有这样一句诗：“迺(nǎi)裹餼粮，于囊(tuó)于囊。”描述的是公刘在出发前做准备，率领众人将丰收的粮食制成干粮，大包小包都装得满满当当。可见有关于包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。不过向来讲究的古人在那时将大包称之为“囊”，而小包则被唤作“囊”。

诗中的“囊”是为了装干粮，古人心想：“既然囊可以用来装干粮，那我随身的钥匙、手巾、印章以及凭证等物件也能装！”毕竟袖口腰间放一堆小东西不仅行走不方便，而且鼓鼓囊囊的看起来也不够潇洒，于是他们就研发出了“佩囊”。这个“佩囊”通常是被挂在腰间，不过它还可以手提或肩背，所以也被称为“持囊”或称“挈囊”。

作为“国民包”，佩囊的材质与款式也在不断升级换代。至春秋战国时期，佩囊易名为“鞶(pán)囊”。据《礼记正义》卷二八《内则》中记载：“男鞶革，女鞶丝。”由此可知升级版“国民包”居然已分男女款，男款的是用皮革制成的，而女款的则是丝制。

唐代 最有名的包是“鱼袋”

唐代以后，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古人对包的需求开始精细化，于是又一新款限定包发布，它就是“鱼袋”。

“鱼袋”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收纳“鱼符”，而所谓“鱼符”多用木头或金属制成，因为外形像鱼而得名。鱼符有两片，分别刻有“合”“同”二字，里面详细地刻着官员的形式、官位、任职何地以及俸禄等情况，这样便于官员被皇帝宣召入宫时，验明

身份，防止欺诈现象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鱼符相当于现代人的居民身份证，而鱼袋则是一种卡包。

此外，唐代与身份地位相关的包还有“笏袋”和“算袋”。“笏袋”是用来装笏的袋子。据史料记载，在唐玄宗时期，丞相张九龄年事已高，若是将笏放在身后，然后再骑乘很困难，于是他就命人制作了一个装笏的布袋子，让随从拿着随行。谁想这个笏袋一出，居然成为了官员上班的“网红包”，很多官员都入手一个。而“算袋”，是官员们用来存放墨、砚、计算用具的袋子，类似现代人的补习袋，不过要有一定品级的官员才能佩戴这种算袋。到了唐玄宗年间，这种算袋不再具有实用性，而是用来作为腰间的一种点缀，只有重要场合时，文职官员才会佩戴。

作为唐代的女性，怎么会放弃“包”治百病的“机会”？虽说唐代最有名的包是鱼袋，但从目前出土的笔画石刻以及陶俑来看，唐代女性对包那是相当有想法。如敦煌第17窟北壁西侧壁画晚唐近事女挂在树上的挎包，通体无任何装饰，只在搭扣处加以点缀，“外缝线”的款式看着就非常时尚；又如西安博物院藏的唐朝胡人背包俑，挎包的外形或方形，或扇形，无论是款式还是裁剪，丝毫不逊于现代人的国际大牌包。

宋代 充满文艺气息的“招文袋”

到了清雅的宋代，士大夫以及读书人已不再追求能象征身份地位的包，而是将充满文艺气息的“招文袋”作为穿搭的标配。“招文袋”又被称为“昭文袋”或“照袋”，民间则称“刀笔囊”。

明代陈继儒《眉公记》载：“从三四苍头，携照袋，贮笔砚、韵略、刀子、笺纸并小乐器之类。照袋，以鸟皮为之，四方，有盖并攀，五代士人多用之。”招文袋是用来装书本文具的包，多用皮革制成，相当于现代人的书包或是补习袋。

招文袋如此盛行，大概是因为它设计简单，不拘泥于材质，也没有过多的镶缀，款式又很利落，实用性很强，像极了现代文艺青年们的帆布包。若是走在宋代的大街上，不背上一个招文袋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文化人。



南宋时期的褡裢(福建福州黄昇墓出土)



出游图(局部) 元代龚开《中山

明清 “褡裢”：老百姓的心头好

招文袋是古代读书人的专属，那“褡裢”自然就是普通劳动人民和小商贩的心头好。“褡裢”追求的是自然随性与实用，它多以藤、草、麻等材料结网成袋，与现代人的草编包、网织包极为相像。褡裢分为两层袋子，使用的时候从中间对折，搭在胳膊上，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叫“褡膊”。

在明清时期，褡裢非常流行，商人或账房先生外出时，总是把它搭在肩上，这样可以将两只手解放出来干活。同时，它也是礼物中的“尖货”，因为褡裢的两个口袋均用来盛放钱币，古人就借“袋”的发音，取“代代有钱”的吉祥之意，来表示祝福。

褡裢也受贵族妇女的喜爱，在福建福州南宋黄昇墓中出土过一个小型的褡裢，系于尸体袍内腰间，全形似两个对称的扇状带相连，呈银锭式，可以合并或展开。可见，褡裢不仅可以搭在肩上，也可以系在腰间。

到了清代，服装纳入了满族服饰的特点，官服中必须佩戴荷包。每年过年，皇帝还将装有金银珠宝的“岁岁平安”荷包作为年终奖赏赐给朝廷大臣们，而民间少女们也在等着将自己亲自缝制的荷包送给心上人。

(《北京青年报》)

谈古论今

夏虫也可语冰



廖柳

“夏虫不可语冰”，此乃《庄子·秋水》里的一言，意为夏天之虫没可能同它们论及冬天之冰，缘其未曾于冬天存在过，对冰自是无概念。实际上，对夏虫而言，它们或许未曾亲身体验冰天雪地之景况，却能经由观测环境之变，避害趋利，领悟“冰”之概念。

人类亦如此。我们的认知受时间、距离、阅历、观念、受教育程度等要素之束缚与影响。从某种角度来讲，我们亦为“夏虫”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认知。

在地质学研究的过程中，有一种传统思维方法称作“将今论古”。就是通过各种地质事件遗留下来的地质现象与结果，利用地质作用的规律，反推古代地质事件发生的条件、过程及特点。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，地球上曾经生活过无数生物，它们的种子、蛋、皮肤印痕、足迹等各种遗留被泥沙掩埋。漫长岁月中，软组织逐渐分解，但像外壳、骨骼等坚硬的部分却与包围在周围的沉积物一起变成了化石，它们原来的形态、结构，甚至细微的内部构造均一同封印入石。今天，研究人员就是根据这些化石中的古生物形态，分析出它们当年的生活情况和生活环境，推断埋藏化石的地层形成年代、经历和变化，从而获得生物的演变规律等信息。倘若人类亦为庄子眼中的“夏虫”，岂非永远无从了解数亿年前的地球发展脉络。(《新民晚报》)

生活史

古人也爱这份凉



谢明军

夏日炎炎，我们总会想到冰激凌带来的丝丝凉意。在古代，那些文人墨客、帝王将相，是否也能享受到这份清甜呢？事实上，古人对“冰激凌”的热爱，远超我们的想象。

早在先秦时期，《诗经》中就有“二之日凿冰冲冲，三之日纳于凌阴”的描述，意思是隆冬时节，人们将冰块凿出，藏入冰窖，以备夏日之需。这说明，古人很早就学会了储冰技术，为夏日制作冷饮打下了基础。

在唐代，冰的使用更加普遍。诗人杜甫在《夏日叹》中写道：“永日不可暮，炎蒸毒我肠。安得万里风，飘飘吹我裳。”炎炎夏日，杜甫也期盼着能有清风徐来，或者来一碗冰饮，以解暑热。而据《唐摭言》记载，唐代的老百姓，就已经开始享用“冰酪”。

宋代，冷饮的制作技术更进一步，“冰酪”成为消暑的佳品。市人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中，详细记载了当时市面上出售的各种冷饮，如“冰雪甘草汤”“冰雪冷元子”“生淹水木瓜”“凉水荔枝膏”等。其中“冰雪冷元子”便是一种类似冰激凌的食品，用砂糖和牛奶制成，冷冻后食用，口感细腻，清甜爽口。

元代，“冰酪”是皇宫内院消暑的佳品。据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记载，元代宫廷里有一种名为“冰酪”的甜品，由牛奶、蜂蜜和各种水果制成，冷冻后食用，口感丰富，深受皇室成员的喜爱。

明代文学家张岱，在他的《陶庵梦忆》中有一段关于夏日吃“冰酪”的描述：“乳酪白醃醃出，霜凝若石，敲之有声，以瓷盏盛之，入梅花、薄荷、薤卜，杂以蔗浆，冰镇而啖之，清凉彻骨。”这段文字，生动地描绘了明代人如何将“冰激凌”做得既美味又富有诗意，加入梅花、薄荷等，使其不仅口感清凉，更添几分雅致。

到了清代，“冰激凌”的制作技艺更加普及，不仅在宫廷中盛行，也在民间广泛流传。清代诗人袁枚，在他的《随园食单》中详细记载了“冰激凌”的制作方法：“用糯米饭，拌以糖霜，入甑蒸之，以熟为度。倾入器中，待其冻结，如冰凌之状，故名冰凌。”这种“冰凌”，实际上就是冰激凌的一种，它以其独特的口感和制作工艺，赢得了清代人的喜爱。

今天，当我们手捧一碗冰激凌，享受着那份来自冰雪的清甜时，不妨也想象一下，千百年前的古人是否也曾在这份清凉中，找到了片刻的宁静与欢愉。(《洛阳日报》)